网课辅导“疫”线孩子的大学生志愿者们

“壹桌计划”公益项目的“前世”与2020的“今生”

本报记者尹平平

高健飞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此刻，身处老家云南保山的他，比以往在北大校园里更抓紧时间。他想尽快搞定，好腾出时间，接着给邓晓晗补课。

邓晓晗正在备战中考，留给她复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由于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她耽误了不少功课，现在需要加倍努力。好在这几个月以来，高健飞这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学生，一直帮她答疑补缺。

两人通过一个名为“壹桌计划”的公益项目结识。这是一个由大学生自发组织，通过网课的形式，为以湖北地区为主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在线家教辅导的志愿服务活动。

“很高兴见到你，但又不希望是以这种方式。希望你尽快回到生活正轨上来。”两人第一次视频通话，高健飞这样对邓晓晗说。

高健飞是“壹桌计划”项目第一位授课的志愿者。自2月底发起至今，已有来自国内外346所高校的2561名大学生志愿者报名参与，558名中小学生接受辅导，其中221名学生来自抗疫一线工作者家庭或患者家庭。

▲5月19日，“壹桌计划”志愿者，来自南京大学的陈阳阳（屏幕右一）为一位武汉小朋友在线辅导英语。 受访者供图

伸出大手去够小手

“壹桌计划”发起人之一耿海天，是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学生。大学期间，他多次给中小学生当上门家教。2月中旬，有学生家长联系他，问能不能通过网课的形式，继续给孩子当家教，这启发了耿海天。

既然都是通过网络，能教北京的孩子，就能教湖北的孩子。而且不光他可以教，很多闲在家无法返校的大学生都可以教。耿海天问了几个同龄的好朋友，大家都觉得可行，便迅速行动起来。

学社会学的大学生负责策划和调研，热衷学生活动、参与过支教的大学生负责招募志愿者，学编程的大学生负责写程序匹配师生数据…… 3月1日，他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第一篇招募志愿者的推送，24小时内，就收到了7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生的报名申请。

找到大学生志愿者很容易，找到想要帮助的中小学生却有点费劲。

家长为孩子无法返校上学而操心的报道，充斥着各类媒体。怎样才能找到这些家庭呢？

“壹桌计划”的另一位发起人，湖南大学数学系大三学生刘逸涵告诉记者，他们主要是想为湖北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尤其想帮到那些因父母在抗疫一线无法顾及孩子的家庭。因此，他们首先通过在湖北上大学或者本身就是湖北人的大学生，寻找湖北地区有需求的家庭。

可是光靠大学生之间互相介绍，难以触达更多湖北中小学生家庭。于是，志愿者们在网上搜湖北各城市的地图，找到中小学校附近的小区，再上网搜那些小区所在居委会的电话，希望通过居委会，向小区居民宣传推广。

“学校附近的小区有些是学区房嘛，肯定会格外重视这事儿。”刘逸涵自以为分析到位，没想到效果并不好，打过去的电话经常没人接，接了也很少得到积极回应。

微信朋友圈、微博、知乎、哔哩哔哩……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又在他们熟知的网络平台上发帖推广。耿海天、刘逸涵等几个喜欢打篮球的大男孩，甚至跑到体育迷集中的虎扑社区去发帖。

好不容易拿到家长和学生的联系方式，最开始接触时，对方多充满戒备。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会不会只是刚开始几节课免费”；有人怀疑是诈骗，根本不听他们说完，就把电话挂断。

尽管频遇闭门羹，但这些大学生的积极性并没有受到打击。耿海天坚持认为，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需求，只是难以接触到他们。

灰暗日子里的微光

杨之勇确实需要这样的帮助。儿子虽然才念小学，但他们夫妇只有高中学历，语文数学还能帮着看看，英语则一窍不通。儿子都笑他：“老爸连car这样的单词都不认识，更别说给我辅导了。”

儿子很争气，在班上一直考第一。但那毕竟只是湖北鄂州碧石镇上的一所小学，学校条件有限，迟迟没有复课，老师只偶尔布置些作业。杨之勇很担心孩子的学业。

通过亲戚介绍，杨之勇接触到“壹桌计划”项目。后来，有三位大学生先后给儿子上过网课，辅导英语的小老师还是英国杜伦大学的留学生。这是生活在小镇上的杨之勇一家，此前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的。

“也许从家长的角度看，孩子需要有人辅导学业。但我知道，这种时候，孩子更需要的是陪伴。”耿海天说，自己此前做上门家教的时候，他的学生之所以喜欢他，除了功课能得到辅导，更重要的原因是，来了个大哥哥陪自己学习。

武汉某医院儿科门诊护士长张兰，从1月21日抽调到抗疫一线，直到5月中旬才返回。几个月来，她只能偶尔和女儿视频通话。女儿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张兰无言以对，愧疚又担心。

女儿上二年级，学业压力并不大。张兰主要是希望能有人陪陪孩子。3月初，得知“壹桌计划”项目，张兰立刻报名。一位南京大学的女生因此成为女儿的家教小老师。从3月初教到5月底，小老师每周安排两节网课，为张兰的女儿辅导语文和英语。

张兰很快发现，女儿对小老师产生浓浓的依恋。再跟女儿视频通话时，女儿竟然对她说：“妈妈，你安心工作吧，我有老师姐姐陪着呢！”

武汉解封后，女儿可以出门玩耍了，但到了小老师的网课时间，女儿就会主动回家上课。

由于到武汉音乐学院参加艺考，齐冉闻疫情期间被滞留在当地，无法返回家乡福州。他和妈妈在武汉租了个一居室，那只是个落脚的地方，锅碗瓢盆都没有，疫情期间连吃饭都成问题。

齐妈妈告诉记者，她感觉那段日子完全是灰暗的。母子俩一天天枯坐在小屋里，一句话都没有。她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也不敢把自己的焦虑说给儿子听。但她知道这样不行，面对高考压力，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不能长时间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通过一个家长微信群的推荐，她听说了“壹桌计划”项目，于是为儿子报名找到了两个家教小老师。“其实我并不奢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帮孩子提高多少文化课成绩，就是希望能有同龄人陪他说说话。”

从此以后，小出租屋里多了其他年轻人的声音。帮齐冉闻辅导英语的小老师，是北大历史系大一学生郭文昌，他是个非常开朗健谈的男孩。听到他与儿子交流的声音，齐妈妈感觉生活中照进来一些光：“就像有邻居把锅借给我们，有陌生人在我们门把手上挂了几个崭新的口罩一样，都是那段灰暗日子里难得的色彩。”

跨越十几年的传递

疫情期间，各种形式的网课满天飞。无论是学校，还是各类教育机构，都提供了免费或付费的网课。有些家长生怕孩子在家耽误学习，给孩子安排了满满当当的网课。在这种情况下，再给孩子找个大学生家教上网课，孩子愿意吗？

马怡然起初确实感觉到，屏幕那头的学生非常消极。

她通过“壹桌计划”项目辅导的学生，是湖北宜昌某校高一的男生。家长告诉她说，孩子的基础不太好，希望能从头讲一遍高一物理。

第一节课，整整一个多小时，男生一言不发，只“嗯”了两声。课讲完，男生说了句：“老师再见”，就下线了。

马怡然身处美国，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是该校生物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她手边没有任何国内高中物理的学习资料。

接到给宜昌男生讲课的安排后，她上网下载高中课本，搜集相关习题，整理考点知识，还在各个视频网站上浏览高中物理公开课的名师视频，把适合这个男生水平的题目都摘了出来。

每上一小时课，马怡然至少要用3小时准备。如此费心，得到的只是男生不到10个字的回应，“这说明我的方法不对，不适合他。”马怡然有点沮丧，但没灰心。

第二节课，她增加了一些和知识点相关的拓展内容，从定理定律被发现的故事开始讲，并且注意将物理知识和日常生活现象相结合。她感觉男生似乎比上节课多回答了几个“嗯”。

第三节课时，讲到摩擦力，马怡然用一级方程式赛车转弯可能会侧翻举例，男生突然说，“我也看F1”。马怡然很惊喜，他终于张口了！

临下课，又提起F1，马怡然跟男生说起自己在美国现场看比赛的经历，男生话匣子总算打开了，还主动关心起马怡然，问她美国那边的疫情。道别时，也不再管她叫老师了，而是跟她说“姐姐再见”。

从那以后，男生和马怡然的交流多了起来。他也会给马怡然讲自己知道的物理学家的故事。做习题时，遇到得意处，他还跟马怡然说：“姐姐你先别讲，先听我给你讲。”

5月底的一堂课，男生上得特别积极，马怡然问他怎么这么有干劲，他说知道这是最后一堂课了，想给姐姐留个好印象。

马怡然把参与“壹桌计划”项目当做自己报恩的机会。17年前“非典”时，她就是类似公益活动的间接受益者。

马怡然是北京人，“非典”时只有4岁，但对那段日子印象极深。姨夫姨妈都是军医，很早就上了一线，表哥无人照看，只能暂住在马怡然家。那年，表哥面临中考，却因焦虑恐惧沉不下心来学习，有时还会发脾气，家里氛围相当紧张。

马怡然的爷爷是大学教授，他请自己的学生帮忙想办法。连续好几个月，先后有4个大学男生通过打电话的方式，给马怡然的表哥辅导功课。

眼瞅着表哥不那么焦躁了，也不发脾气了，家里的气氛也缓和下来。马怡然打心底里感谢四位素未谋面的大哥哥。更没想到的是，表哥的成绩大幅提升，考上了当年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北京四中。

当马怡然得知“壹桌计划”项目后，第一时间报名。虽然远隔重洋，要克服时差和资料缺乏等困难，但她认定自己“必须要参加！我没法当面感谢当年帮助我哥的那几位大学生，现在我要以这种方式，把对他们的感激传递下去！”

杨之勇也希望儿子长大后像马怡然一样，能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他对记者说，他也知道，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儿子并不一定能向小老师学到多少知识。“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给小孩的人生，上了很好的一课：让儿子知道，即使在这种时候，也有人想尽办法去帮助别人。希望他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不再感觉“无能为力”

高考前一个月，冯芝杰仍在接受“壹桌计划”家教小老师的辅导。三个多月来，她的高考模考成绩提高了100多分。原先认为考上华中科技大学是难以企及的梦想，现在看来梦想有望实现。

冯芝杰疫情期间并没有被封在家乡武汉，因为提前到北京参加艺考美术特训，就滞留在了北京亲戚家。

读大学的表姐推荐她通过“壹桌计划”找个网络家教，她起初有些不情愿，没想到小老师们特别认真，准备艺考耽误的一些基础复习，小老师们耐心地帮她补了起来。

有时课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小老师还会在课下专门写PPT、录很长时间的视频把问题讲透，传给冯芝杰，还反复叮嘱她：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随时再问。“他们这样耐心地陪着我、督促我，我也不忍心辜负他们，自己要更努力才是。”

高健飞并不认为自己给邓晓晗当义务家教，只是单纯地付出，他觉得自己也有很多收获。“它让我总算能为疫情做些有意义的事，也让我体会到自己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

云南保山老家，疫情并不严重。参与到“壹桌计划”项目之前，每天变化的确诊病例，对高健飞来说只是一串数字。直到开始给邓晓晗上课，接触到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人，他才对疫情有了切身的感受。

王润昕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留学，她也曾像高健飞一样，感觉自己距离疫情很远。

国内疫情暴发之初，身处海外的王润昕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参与创建“壹桌计划”项目后，她感觉自己真正参与到了战疫行动中，而不是远远地看着无能为力。

刘逸涵告诉记者，参与“壹桌计划”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说起参与初衷时，多数提到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无力感。“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但实在想不出来能做什么，感到无力又痛苦。”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大一学生林洺桐，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学校曾组织党员为湖北抗疫捐款，林洺桐也把钱汇过去，却被婉拒，说暂时还不能接受入党积极分子的捐款。林洺桐多少有些沮丧。

通过参与“壹桌计划”，林洺桐为湖北宜昌一位高三女生辅导数学和政治。每周和她隔着屏幕同在书桌前学习，听她讲自己的学习困惑和高考目标，给她讲答题技巧并为她打气，总算实现了自己“帮到湖北”的心愿。

黄瑛在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读大三，她虽然学医，但距离能亲自上一线抗疫还很遥远。疫情期间，她在“壹桌计划”项目当助教志愿者，帮小老师和学生家长们沟通联络。其中有几位家长是湖北地区医护人员，这让黄瑛感到自己也能为前辈们帮上忙。

“他们在前方用专业能力保护我们，我们在后方以这种方式支持他们，感到自己也是有力量的，在这场疫情面前，并没有束手无策。”黄瑛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邓晓晗、张兰、齐冉闻、冯芝杰等为化名） 编辑刘梦妮

“特别列车”见证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本报记者郑明鸿、刘智强

5月31日16时41分，从重庆开来的5629次列车，到达遵义市桐梓县境内的蒙渡火车站。早已等候在此的余庭华和妻子罗成群，背着自家种的桃子和李子，和10多位村民一起走出候车室，搭乘这趟列车前往遵义城区。

这趟绿皮慢火车全程票价23.5元，最低票价仅2元，“从经济效益出发，一直处于亏本状态。”遵义车务段桐梓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建平说。

目前，全国共有81对这样的绿皮慢火车，在追求速度和效益的今天，它们为什么仍在服役？

村民的重要依靠

余庭华身材清瘦，背着100余斤桃子，腰有些微曲。登车时，他先转身将背篓稳放在列车过道上，又转身用力将其往里推，随后又接过了妻子身上的背篓。

50岁的余庭华家住桐梓县新站镇九龙村，年轻时在广州务工为生。2016年回到家乡，和妻子做起蔬菜水果生意。

“种了3亩桃子，2亩多李子，还有一些蔬菜。”余庭华说，“什么成熟了就卖什么，都是自家种的。”

余庭华和妻子搭乘的5630（5629）次列车，开行于20世纪60年代，已有50多年历史。

“刚开通时，沿线村民坐这趟车外出卖菜，旅客也特别多。”曾担任5630次列车列车长、现退休在家的曲斌说，最初还有重庆的菜贩乘坐火车到遵义卖菜，遵义到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后，这部分菜贩就改走高速。

5630次列车列车长杨丽介绍，这趟列车没有空调、餐车和卧铺，途经站点大都在深山区，是沿线村民出行、求学和做生意的重要依靠。

“她身体不好，我也不能出远门，只能靠卖菜维持生计。”余庭华说，妻子罗成群三年前查出患有尿毒症，每周至少需要到医院透析两次。

为了方便妻子看病，余庭华在遵义城区租了一个单间，房租每月200元，这间屋子如今也是夫妇俩到遵义卖菜时的歇脚点。头天傍晚，坐5629次列车到遵义，在出租屋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卖完菜后再坐5630次列车回家。

票价便宜是余庭华夫妇选择这趟列车的主要原因。“坐这个车很省钱，也很方便，就当是公交车了。”罗成群告诉记者，如果从新站镇坐汽车到遵义，需要到桐梓县城转车，连人带行李，加起来要近百元，远不如坐火车划算。

余庭华说，平时也有商贩到村里收购蔬菜和水果，但价格较低。为了卖出好价钱，他更愿意坐火车到遵义卖菜。“以桃子为例，卖给商贩，每斤桃子卖两三元。在菜市场零售，就可以卖到5元钱，甚至更高。”

今年受疫情影响，余庭华夫妇直到3月份才外出卖菜，而在往年，春节期间也不停歇。“正常情况下，每年卖菜能挣1万多元，加上打零工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费没有问题。”

“是为老百姓开的”

5月31日傍晚18时18分，列车驶达桐梓火车站。遵义市永坪中学初二年级学生令狐荣琴，在姑姑的陪同下登上列车。当天是周日，她准备坐火车回学校上课。

令狐荣琴家住桐梓县芬石镇团结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永坪中学。“我平时住在姑姑家，大概每个月回家一次。”和余庭华夫妇一样，令狐荣琴坐这趟车也是因为票价便宜。

“这趟车比较实惠，是为老百姓开的。”坐在一旁的姑姑令狐世芬说。

曲斌介绍，周五和周日，列车上就能见到百余名初高中学生。周五坐车回家，周日再坐车回校。

回忆起乘坐5630（5629）次列车上学的经历，目前就读于贵州财经大学的周敏感触颇多。“我家住新站镇四新村，初中毕业考到桐梓县第一中学。高中三年，这趟列车成了我的校车。”

在列车上，周敏和同学会聊些学校里的趣事儿，或者讨论过去一周所学的新知识。“以前周五放学后，我们会结伴去车站坐车，一路上有说有笑，感觉很开心。”周敏说，新站镇到桐梓县城也有客车，单边票价为16元，和慢火车相比还是要贵很多。

今年3月16日，贵州省99万初、高三年级学生率先开学。5月6日，遵义市初高中非毕业年级也开学了，5630（5629）次列车上又活跃起了“青春”的身影。

“这趟车不能停”

10多年前，关停5630（5629）次列车的议题曾被提上案桌。因为上级部门不同意，这趟车得以继续穿行在革命老区，造福沿线村民。

因为票价低，沿线站点多，配备的工作人员也较多，这趟车目前仍在亏本运营。“社会效益是这趟车继续开行的主要原因。”张建平告诉记者。

他说，以前农村的村村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交通条件不好，一些沿线乡镇的工作人员也会乘坐这趟车上班。“现在的客流量大概是以前的50%多一点。”

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张承凤和家人从新站镇搬迁到了位于桐梓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并在遵义城区找到了工作。张承凤每个月会回家一次，由于不赶时间，加之票价低，5630（5629）次列车便成了她的首选。“这趟车真的方便了沿线的农民，也方便了我们这些打工者。”张承凤说。

对很多人而言，“慢火车”已经成为一种记忆。但带有公益性质的深山“慢火车”，仍在改善山区村民的出行环境，降低他们的出行成本。它们不仅是一趟列车，也是山里人的“赶集车”和求医上学的“公交车”。

目前，全国81对绿皮慢火车主要运行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交通不便山区。单论经济效益，它们在做赔本买卖。在高铁网络贯穿全国的今天，它们的“简陋”与“慢速”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它们满足了偏远山区的民生需求，承载着浓厚的民生情怀，是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人”的时代表达。

“这趟车很多乘客都是‘老面孔’，沿线的菜农得到了实惠，感到开心，我们就跟着开心。”杨丽说，“虽然一直亏本运营，但这趟车不能停”。

编辑刘梦妮